

社群主義的重建及社會資本的創造： 香港PISA預試結果初探

藍郁平

何瑞珠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及政策學系

社會資本的議論在社會學、經濟學及教育學均漸受關注，社會資本的創造更成為解決社會問題及改善教育的良方。可是，不同學者對社會資本有不同的理解，本研究嘗試應用社群主義的觀點，檢視社會資本的概念及社會資本的創造與功能。研究樣本為參與HK-PISA預試的學校共31所，分析資料來自學生問卷1,067份及家長問卷1,061份。按照社群主義的觀點，社會資本對個人及社會均具有正面的效應。根據PISA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Globalization: New Horizons for Educational Change” of the Hong Kong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held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cember 20–21, 2002. The authors are grateful for the support received from the Direct Grant and the United College Endowment Fu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Quality Education Fund.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is article are of the auth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ose of the granting agency.

本文通訊地址：何瑞珠，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教育行政及政策學系
電子郵箱：estherho@cuhk.edu.hk

預試數據，可初步引證這理論的真確性。本研究採用因素分析及迴歸分析。初步分析結果顯示三個類型的社會資本與學生學業成效呈不同的相關性，而兩者間的相關性不一定正面。

關鍵詞：社會資本、社群主義、家校合作

文獻回顧

何謂社群主義

「社群主義」一詞要追溯至1841年由世界社群主義協會（Universal Communitarian Association）的創立人Barnby所創造（Etzioni, 1998）。九零年代之前，已有不少社會科學學者的著作中提及社群主義的理念，可是這批學者並沒有稱自己為社群主義者。直至1990年，十五位學者，包括Amitai Etzioni及William Galston等，正式確立「社群主義者」這個稱號，並在美國開展了社群主義運動。他們的社群主義運動的重點在於：透過重建社群，讓人們共同努力塑造一個新的道德、社會及公共秩序。他們建議自由的個體，需要社群互相支持免受國家的侵害以及維持道德。道德的維持通過對親屬、朋友、鄰居及其他社區人士的推動，而非靠政府的操控或對權威的害怕而達成（Etzioni, 1993）。

根據Etzioni (1993)的觀點，社群主義依賴社群的功能以解決社會問題，從而重塑社會。社群主義者相信社會已被個人主義所侵蝕，因此重建及恢復社群十分重要。因為道德標準能夠因「包容的社群」的存在而得以提升，而這亦可促進社會的凝聚。在社區中，學校與家庭是兩個維持社群的重要機構。在美國，家庭與社區被極端的個人主義所侵蝕，而且其嚴重情況已令社群主義者必須行動起來。因此，首要任務是重塑家庭成為社群主義所倡議的「社群主義家庭」。至於學校方面，則要恢復成為「社群主義學校」。

在社群主義脈絡下的社會資本

社群主義觀點強調社群主義家庭及社群主義學校為理想的形式，而兩者的特點均有助創造社會資本。以下將詳述社群主義家庭及社群主義學校如何創造出社會資本。

1. 社群主義家庭及社會資本的創造

在社群主義的觀點下，社群主義家庭一詞是用來形容那些父親及母親同時主動地全情投入教養子女的家庭類型（Etzioni, 1993, p. 25）。社群主義家庭的特點是指擁有親密的親子關係，子女被認定為家庭中重要的成員，而父母均有責任全力教養子女。

對社群主義者來說，重建家庭關係以重建社群是一個主要課題。重建家庭關係亦即父母應投入多些時間在家庭，維繫夫妻關係，以減低離婚出現的可能性。Etzioni (1993)認為，父母同在的家庭對兒童來說最理想。原因是照料子女勞心勞力，必須父母能分工合作地教養子女，這樣親職工作才會做得更好。

以社群主義觀點來看，社會資本可透過適當的行動來維持及創造。首先離婚不應予以鼓勵及應制訂嚴謹的法律來管制等。第二，照料子女是父母的共同重要職責，父母應多花時間教養子女，使其成材，成為社群的良好公民。當父母在經濟上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便應多花時間在子女身上，少花時間追逐名利及金錢。此外，父母應分擔教養子女責任，不應只推在父或母一方，更不應推卸到其他人身上。因此，社群主義家庭中的兒童與父母接觸較多，便能夠更親密地連繫，從而產生較多社會資本。

子女與父母連繫的強度，與父母和子女之間互動的素質及時間有關。但是，很多家庭所面對的問題，在於父母沒有投入足夠時間在子女身上。在雙親同在的家庭裡，父母可靠分工合作來解決此問題。而單親家庭則需靠提升父或母和子女之間互動的素質來解決此問題。然而，如Etzioni所言：所花時間的多少與親子素質的高低同樣重要。因此，無論父母在照料子女的質素方面有多好，父母投入

照顧子女的時間不足，是不可建立足夠的社會資本讓子女受惠。若從以上社群主義的觀點來看，現在香港及大部分高度發展的社會，單親家庭及雙職家庭造成忙亂的生活，正使家庭日益處於危機境況。

2. 社群主義學校及社會資本的創造

隨著現代化的社會發展，家庭的社化功能減弱，所以進入學校的兒童多是在性格和德育方面得不到足夠的發展，例如缺乏責任感及承擔社會的道德價值。在這情況下學校需負起這些責任，以維持社會的道德基礎。

從社群主義觀點來看，社群主義學校的課程應加入性格教育及道德教育。因為性格的培養給予兒童心靈的基礎，讓他們學習控制自己的情緒及延宕獎賞（delay of reward），使其在行為上能符合道德的準則而完成任務（Etzioni, 1993）。通過道德教育亦可教導兒童明白對與錯，令他們承擔起代代相傳的道德價值。

性格培養及道德教育不能單憑課室的教授，而應透過學校內所提供的各種經驗和師生之間的互動來達致。Etzioni (1993, p. 107)認為，社群主義學校的教師應較現時一般學校的教師更緊密地與學生連繫。教師與學生的緊密連繫，有助學生性格的培養及道德觀的建立。此外，社群主義學校能透過密切的師生關係，產生更多社會資本。

社群主義重視社群網絡。學校被視為一個社群，而教師、家長及學童在此相連。社群主義學校提倡社群網絡的建立。正規的網絡如家長教師會（PTA）的成立，有助家長與家長及家長與教師之間的連繫。另一例子是家長參與學校日常運作，甚至家長參與學校行政決策，均有助家長建立對學校的歸屬感及擁有感。Etzioni (1993, p. 14)指出，學校需要多些家長參與，以便學校能更有效完成其教育責任，而賦權予家長更是建立社群的一種重要方式。換句話說，賦權予家長能有助家長與教師達致真正的溝通，繼而建立更緊密的伙伴關係。因此，按照社群主義的觀點，社群主義學校強調家長與教師良好的關係，亦即在社群主義學校，能產生更多的社會資本。

3. 家庭、學校及社區

一般來說，家庭、學校及社區是相互連繫的，家庭與學校是社區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們被認為是能對社區作出貢獻的機構。對於一個在社區中成長的個體，社化過程首先在家庭發生，然後才到學校。因此，家庭與學校的角色影響了社區的存活。另一方面，社區對家庭及學校的維持有正面影響，因為社群的成員可投入多些時間及資源以支援家庭及學校。

以社群主義觀點來看，要強化家庭及學校之間的連繫，可透過提升家長參與學校的層次而達成。例如，鼓勵成立PTA，因為它能加強家長及教師之間的協作，令家庭及學校在支援社群方面的效能加強。

小結

本文嘗試揉合社會資本與社群主義這兩個概念，建構出本研究的理論架構。文獻回顧中發現在社群主義觀點下審視社會資本的理念，社會資本對社會成員的連繫有其自足的價值，它對下一代的成長亦具正面的效應，因此，對社會資本的維持和創造尤為重視。可是，Etzioni等人所提倡的社群主義觀點受到不少學者的質疑。例如：Woolcock & Narayan (2000)認為社群主義的觀點著重地區性社群內在的優點及自給自足，卻低估了這種內在聯繫可能造成如「排他性」等負面影響。

雖然如此，如果相信社會資本在教育及其他範疇是十分有用的概念，我們應深入探討在各種脈絡下其意義的變化。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時間脈絡的變化。例如八十至九十年代的西方社會被自由主義及個人主義所主宰，但隨著社群主義的冒升，今天的社會已有不少社群主義的聲音。在歐洲及美國，社群主義網絡已經建立，用作向各政治黨派推廣其意念和行動（Tam, 1998, p. 2）。而社群主義的思想在八十至九十年代已吸引不少如Al Gore及Tony Blair等政治家的注意。

以上所說是關於時間的改變而出現的社會脈絡的變化，此外還有基於地域上不同而出現的社會脈絡。我們現時所處的亞洲文化下的社會或社群，與西方社會比較，其蘊含的社會資本的量和質及其發揮的正面或負面功能亦可能有異。

在香港社會脈絡下的反思

1. 對社會資本的一些討論

在廿一世紀的今天，香港的學校正經歷連串的教育改革，但紛亂的改革可能會侵蝕學校內的社會資本。例如教師為了應付課程及教學法改革的要求，需投入更多的時間去理解新課程，為種種基準試而進修；在學校的行政方面，例如「非教學的」引入校本管理，教師及行政人員需為此兼顧不少的行政工作。教師工作量因而增加，但教師與學生共聚的時間卻減少，這亦可能使到教師與家長的接觸減少，即令學生、家長與教師之間的互動減少，最終是社會資本的流失（erosion of social capital）。

人際網絡可產生正面或負面的效應。Wal, Ferrazzi, & Schryer (1998) 發現一些團體或社群因其內在擁有強大的社會資本而排拒其他社會成員。正因為資源是有限的，為了保障團內人的利益而造成壟斷資源。

2. 對社群主義的一些討論

社群主義者鼓吹傳統的雙親家庭為理想模式，但這種看法未免不合時宜。因為雙親家庭的家長並不一定較好地教養子女。而教養的質素取決於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承擔。來自單親家庭的父母也可把工餘時間多花在子女的教養方面，教養的質素可能較一些父母只關注自己事業的雙親家庭為佳。因此，當談及社群主義家庭，太過強調雙親家庭的結構，而忽略現已存在多元的家庭結構是不恰當的。

另一方面，亞洲或中國的單親家庭問題並非如西方國家般嚴重，因為中國人的文化背景並不鼓勵離婚。香港亦只有約10%的單親家

庭，而美國在1988年已超過30%。但無論哪個類型的家庭結構，大部分家長投入教養子女的時間不足的問題確是相當嚴重。在經濟衰退的問題下，僱主要求員工工作時間增長，再加上在知識型經濟的社會，鼓吹各人持續進修，這最終可能導致在職人士花在子女身上的時間減少。如果循這途徑去思考，政府及商業機構理應負起解決這問題的責任。

3. 社群主義觀點在香港或中國人社會的適切性

Etzioni (1993)認為社群主義的思想適用於美國及大部分的西方國家。美國社會未能運作良好因為美國人過於自我中心，所以需要鼓吹「以我們為先」的取向。換句話說，西方國家應多關注身處社群的事宜。從這取向著手，西方的社會網絡才可維持、重塑及創造。但Etzioni認為中國及日本這些國家則需向相反方向著手，解除過度的社群束縛，即社群主義的思想未必適合於東方世界。雖然如此，香港是中西文化交匯之地，中國文化的傳統價值雖然仍於香港存在，但是香港人同時受到來自西方國家的文化所影響，因此，美國社會所面對的個人主義問題在香港也存在，只是程度上可能輕微一點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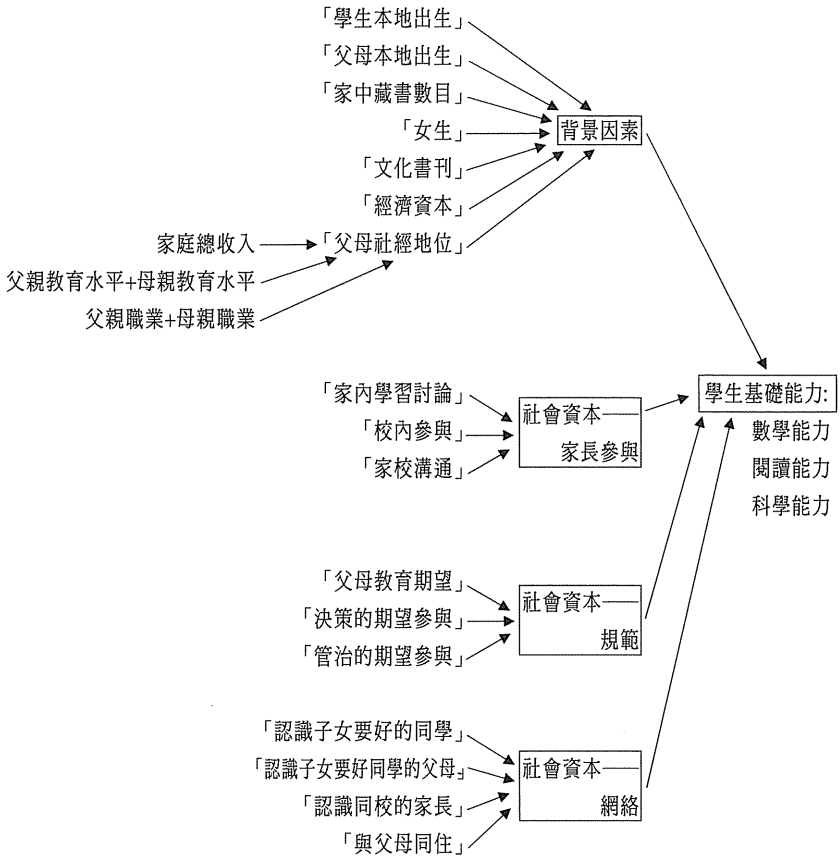
研究理念架構及研究問題

根據文獻探討及量度工具的建構，本研究的主要問題有兩方面：

1. 學生特徵、家庭背景及學校背景因素與其所擁有社會資本的相關情況如何？
2. 當控制學生背景因素後（例如：家庭結構、學生的性別及父母社經地位等），學生基礎能力與其所擁有社會資本的相關情況如何？而其中哪些範疇社會資本是較重要，哪些範疇較次要，哪些範疇沒有相關？

本研究的理論架構包括三種形式的社會資本及背景因素變項，如下所示：

圖一 背景因素、社會資本及學生成就的關係



研究設計

樣本

本研究的資料來自2001年完成的「學生基礎能力國際研究計劃」預試。「學生基礎能力國際研究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簡稱PISA)由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OECD)策劃,四十多個國家參與(OECD, 1999)。在香港,此項計劃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教育研究所統籌。評估分為三個領域：閱讀能力、數學能力及科學能力。評估內容由參與國家的學者共同協作制訂，再經國際學科專家審議及各國的專家委員會批核。HK-PISA預試於二零零一年七月完成，參加預試有31所以分層抽樣抽取不同學生的學業水平的學校，學校所收取學生的學業水平由高至低而分為英文中學（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中文中學（Chinese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CMI）-高能力學校、CMI-中等能力學校及CMI-能力稍遜學校。每所學校通過隨機抽樣，抽取35位15歲學生（中一至中五）進行測試。樣本總人數為1,087人。

研究工具及分析方法

1. 問卷資料

本研究利用兩份問卷來進行調查研究，一份為家長問卷，另一份為學生問卷。對這些學生及其家長進行問卷調查後，收回學生問卷1,067份及家長問卷1,061份。從問卷中獲得參與測試的學生的一些家庭的背景資料、家長對子女學業的期望及家長參與子女學習的情況等資料。

2. 工具的量度分析

本研究進行了兩次的因素分析以建構出與社會資本有關的變項。首先，對家長問卷第13題進行因素分析。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可分為三個社會資本因素，第一個因素是家長在家內的子女學習的參與和討論（簡稱為「家內學習討論」），第二個因素是在校內的家長參與（簡稱為「校內參與」），第三個因素是有關家長與學校方面的溝通（簡稱為「家校溝通」）。

從表一之固有值（eigen value）及平均變異數（variance explained）顯示：「家內學習討論」、「校內參與」及「家校溝通」三個因素合共解釋了家長在家中及在學校中的家長參與51.0%的變異數。

表一 「家長參與」各項目在因素分析中的因素負荷

	因素		
	「家內學習討論」	「校內參與」	「家校溝通」
與子女討論電影、電視或書刊	.787		
與子女傾談學校生活	.780		
與子女討論時事	.766		
與子女談論學校功課	.673		
與子女聊天	.644		
與子女一起聽古典音樂	.418		
參與學校PTA的工作		.794	
協助學校的義務工作		.739	
和校內其他家長連繫		.589	
協助籌款或捐贈禮物活動		.509	
和子女的老師討論子女的學習情況			.721
參與學校的家長日			.667
與校方或教師保持聯絡			.662
固有值	2.952	2.046	1.632
平均變異數	22.71%	15.74%	12.56%

表二 家長對學校事務的期望參與程度的各項目在因素分析中的因素負荷

	因素	
	「決策的期望參與」	「管治的期望參與」
教學語言的安排	.771	
訂定學生行為規範	.767	
分班方法	.750	
參與評估學校質素	.726	
訂定學校教育目標	.722	
開設新課程	.710	
參與制定學校的整體發展計劃	.683	
學校的訓導政策	.674	
校董會的工作		.891
教師及行政人員的任命及安排		.848
固有值	4.325	1.977
平均變異數	43.25%	19.77%

對家長問卷第13題進行因素分析。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可分為兩個社會資本因素。第一個因素是家長對一般學校政策作決定的期望參與程度（簡稱為「決策的期望參與」），第二個因素是對學校的管治方面的期望參與程度（簡稱為「管治的期望參與」）。

從表二之固有值（eigen value）及平均變異數（variance explained）顯示：「決策的期望參與」及「管治的期望參與」二個因素合共解釋了家長對學校事務的期望參與63.02%的變異數。

3. 「社會資本」的量度

Coleman (1988)提出社會資本以三種形式存在：網絡（informational channel）、社會規範（social norms）及義務（obligation）。

本研究根據Coleman的理念，量度以下三種形式社會資本：

i. 網絡—兩個範疇：「家庭網絡」及「學校網絡」

一些學者（例如：Astone & McLanahan, 1991）以家庭結構及父母與子女的依附或互動作為量度「家內社會資本」的指標（何瑞珠, 1999）。這些變項可被認為代表「家庭網絡」。本研究亦採用來自學生問卷的「與父母同住」此變項，來量度「家庭網絡」。「學校網絡」則採用來自家長問卷的「認識子女要好的同學」、「認識子女要好同學的父母」及「認識同校的家長」此三個變項來量度。

ii. 規範

Coleman & Hoffer (1987)將母親對子女學業成就的期望作為一種「家內社會資本」的指標，用來預測學生的輟學。同樣地，本研究採用父及母對子女學業成就的期望，簡稱為「父母教育期望」，作為社會資本的指標。經因素分析所建構出的兩個因子，即「決策的期望參與」、「管治的期望參與」，亦屬於規範此形式的社會資本。

iii. 家長參與—兩個範疇：「家內家長參與」及「校內家長參與」

根據Muller (1993)所說，家庭內父母參與子女學習可概念化為一種社會資本（Ho, 2000）。同樣地，經因素分析所建構出的因子，即「家內學習討論」，可以用來量度「家內家長參與」，而另外兩

個因子，即「校內參與」及「家校溝通」，則可用來量度「校內家長參與」。

4. 背景變項

本研究使用了三類的背景變項，即家庭因素、學生因素及學校因素。

i. 家庭因素

本研究使用了六類的家庭方面的背景變項，即「父母社經地位」、「父母本地出生」、「父母宗教依附」、「子女的數目」、「經濟資本」及「文化資本」。由家長的教育程度、職業及收入的情況組合而得出「父母社經地位」，以父母是否屬於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來判別有否「父母宗教依附」，「經濟資本」則根據家中擁有電腦、樂器、汽車和浴室的數目來建構出。「文化書刊」及「家中藏書數目」此兩文化資本變項為本研究所採用。「文化書刊」根據家中擁有文學經典、詩集、藝術品和百科全書的數目來建構出。

ii. 學生因素

學生的性別取自學生問卷。男生被訂定為0，而女生則訂定為1。所以此變項稱為「女生」。本研究將學生的出生情況以虛擬變項方式，建構出「學生本地出生」，而這變項的結果是基於與學生在國內出生比較而得出。

iii. 學校因素

學校類型根據學校所收取學生的學業水平由高至低而分為EMI、CMI-高能力學校、CMI-中能力學校及CMI-低能力學校。本研究將這些學校類型以虛擬變項方式建構出CMI_H（CMI-高能力學校）、CMI_M（CMI-中等能力學校）及CMI_L（CMI-能力稍遜學校）這三個學校因素變項。而這些變項的結果是基於與EMI學校比較而得出。

統計結果與分析

描述分析：被研究者的背景資料

本研究所涉及的學生總人數為1,067人。男生佔46.7%，而女生佔53.3%。女生所佔的人數較多。有關被研究者的家庭背景資料，一般家庭人數為4-5人，其中子女數目一般為2-3人，在學子女數目一般為1-2人。家庭的結構以核心家庭為主，即通常是父母再加上約1-3名在學子女所組成。而大家庭（擴大式家庭或直幹式家庭）的數目並不多。絕大部分（89%）接受此次測試的學生與親生父母同住，而屬於單親家庭的只佔8%而已。父母教育程度一般為初中。父母職業方面，父親主要為一般工人、技術員及工匠、機械操作人員和商人或自僱人士，母親主要為家庭主婦。家庭收入方面，約有一半家庭的收入少於港幣15,000。將父母的教育程度、父母的職業及家庭收入一併考慮而建構出父母的社經地位，可發現一般家庭都屬於低下階層。超過一半的父母是香港出生，而子女方面則超過八成為香港出生。父母的宗教信仰方面，約七成沒有宗教信仰，而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只佔5-8%左右。此樣本的家庭經濟資本一般並不多，而所擁有文化資本則不少，一般家庭都擁有兩類或以上文化項目。而家中藏書數目方面一般家庭擁有50本書左右。

背景因素與各社會資本變項的關係

利用背景因素作自變項，而各社會資本變項作依變項，進行迴歸分析，以找出背景因素與各社會資本變項的關係。由於初次分析時發現經濟資本及文化資本變項與社會資本無顯著相關，所以再次分析時將這些變項刪去。結果如表三、四所示。

對於父母社經地位這背景因素，簡單來說，結果顯示父母社經地位與三種形式的社會資本有顯著相關。這可能顯示出高社經地位的家庭很有可能擁有較多的社會資本。

表三 各背景變項對「社會資本—家長參與」及「社會資本—規範」的迴歸分析

	家長參與			規範		
	家內學 習討論	校內 參與	家校 溝通	父母教 育期望	決策的 期望參與	管治的 期望參與
家庭因素						
父母社經地位	.165***	-.086*	.048	.116**	.147***	.010
父母本地出生	.037	.026	.049	-.078*	.078*	.030
父母的宗教依附	-.048	.085*	-.046	.028	.048	-.049
子女的數目	-.172***	.016	.000	-.057	-.090*	.032
學生因素						
女生	.074*	-.024	-.035	-.028	-.021	-.032
學生本地出生	.105**	-.009	.031	-.007	.088	.007
學校因素						
CMI_H	.014	.008	.039	-.087*	.015	.031
CMI_M	-.041	.026	-.015	-.080*	.011	.031
CMI_L	-.043	.042	.096*	-.168***	-.004	.056
總體R ²	.104***	.016	.019	.060***	.073***	.009

* $p < .05$. ** $p < .01$. *** $p < .001$.

表四 各背景變項對「社會資本——網絡」的迴歸分析

	網絡			
	認識子女 要好的同學	認識子女 要好同學 的父母	認識同校 的家長	與父母 同住
家庭因素				
父母社經地位	.098*	-.033	-.021	-.040
父母本地出生	.039	-.025	-.005	.023
父母的宗教依附	-.006	.021	.005	-.108**
子女的數目	-.080*	-.005	-.021	.041
學生因素				
女生	.179***	.058	.057	-.059
學生本地出生	.045	.018	.148***	.057
學校因素				
CMI_H	.024	.020	-.001	.003
CMI_M	.002	.007	-.072	-.074
CMI_L	.004	.001	.003	-.104*
總體R ²	.057***	.006	.033**	.035**

* $p < .05$. ** $p < .01$. *** $p < .001$.

父母社經地位越高，則「家內學習討論」越多，「父母教育期望」越高及更期望參與學校的一般校政決策。這些高社經地位的父母在家投入多些時間協助子女學習，也希望透過參與一般校政決策，間接令子女的成績得以提升。較特別的地方是高社經地位的父母較少「校內參與」，例如參與PTA及學校義務工作等，相反低社經地位父母則較願意參與這些工作。究其原因，可能是那些父母工作較忙碌，對工作較重視，亦有可能他們覺得「校內參與」較參與學校行政決策對子女學習幫助較少。

上表結果亦顯示「父母本地出生」有較低的「教育期望」，但有較高的「校政決策的期望」。此外，「父母的宗教依附」與「校內參與」呈顯著正相關，而與「與父母同住」呈顯著負相關。父母為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有較多的「校內參與」。香港有頗多基督教或天主教的學校。基於相同的宗教背景，可能使到這些父母有較多的「校內參與」。以往文獻指出那些有宗教背景的父母會有較多「家內學習討論」，但本研究結果不支持這說法（Coleman & Hoffer, 1987）。

子女數目越多則父母與子女的討論較弱。由迴歸分析中發現子女數目與「家內學習討論」、「決策的期望參與」等社會資本有負相關。這結果是合理的。對於一些擁有較多子女或在學子女的家庭，有較少的家內討論及較低參與學校行政決策的意欲是可預期的。因此上表的數據為負值。

學生的性別與「家內學習討論」有關。女生有較多的「家內學習討論」，即女生家長通常有較多家內的家長參與，但學校方面的參與則與男生家長差不多。學生的性別亦與「認識子女要好的同學」有關。這可能反映女生父母較重視子女結交朋友和同學的情況。

學生的出生情況可分為本地出生、國內出生及外國出生。與國內出生相比，「學生本地出生」與「家內學習討論」及「認識同校的家長」呈顯著正相關。原因可能是國內出生的學生的家長「為口奔馳」，無暇關注子女的學習及參與學校的家長活動以認識多些同校的家長。

以學校類型為變項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與「父母教育期望」有明顯的相關。EMI學校的家長比來自CMI學校的家長教育期望較低，尤以CMI_L學校的家長為甚。而CMI_L學校的家長卻比EMI學校的家長有較多「家校溝通」。這結果可能反映家長因子女的學習問題或在學校的行為問題，而被要求與學校多些溝通。

社會資本與學生基礎能力的關係

本研究使用分層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來找出社會資本與學生基礎能力的關係。因為使用英文答卷的EMI學校學生在測試中所得分數明顯地比使用中文答卷的EMI學校學生為低，所以在進行分層迴歸分析之前，來自佔總樣本數目約三成的英文答卷的樣本數據應予刪除。而本研究分析將集中在中文卷作答的學生上。

背景因素變項

將七個背景因素作自變項，一同放進迴歸方程式中以預測PISA測試的成績（見表五模式I）。結果發現它們對數學能力、閱讀能力及科學能力的成績的變異數分別能消減13.1%、19.8%及10.0%。但七個因素中，只有「女生」、「學生本地出生」及「家中藏書數目」在標準迴歸係數的檢定時呈現顯著水平（ $p < .05$ ）。而「學生本地出生」、「父母本地出生」與數學能力的成績具顯著相關，而「文化書刊」與科學能力的成績有相關，在標準迴歸係數的檢定時呈現顯著水平（ $p < .05$ ）（見表五）。

1. 父母社經地位

預期「父母社經地位」對三種基礎能力的成績應有明顯的正面效應（Ho & Willms, 1996），但本結果發現關係並不顯著。原因可能是以學生為分析單位時，其效應不顯著。若改以學校為分析單位時，或許會有效應。

表五 社會資本對預測PISA測試成績的分層迴歸分析結果(中文答卷)

	數學		閱讀		科學	
	模式 I	模式 II	模式 I	模式 II	模式 I	模式 II
背景因素						
父母社經地位	.065	.036	.050	.014	.064	.078
父母本地出生	-.151*	-.155*	-.075	-.056	-.128	-.145*
經濟資本	.126	.113	-.002	.013	-.073	-.079
文化書刊	.087	.098	-.034	-.010	.115	.151*
家中藏書數目	.209**	.178*	.300***	.290***	.170*	.139*
女生	-.110	-.126*	.122*	.131*	-.137*	-.094
學生本地出生	.191**	.169*	.243***	.182**	.245**	.245**
社會資本						
家長參與						
家內學習討論		.154*		.094		.163*
校內參與		-.050		-.145**		-.012
家校溝通		-.062		.009		-.009
規範						
決策的期望參與		.021		.039		-.006
管治的期望參與		.002		-.104*		.070
教育期望		.110		.103*		.042
網絡						
認識子女要好的同學		-.083		-.064		-.191*
認識子女要好的同學的父母		-.035		.073		-.016
認識同校的家長		.173*		.092		.009
與父母同住		-.036		.047		.066
總體R²	.131***	.190***	.198***	.266***	.100***	.156***

註：數學 ($X = .6384$, $SD = .1812$)，閱讀 ($X = .6203$, $SD = .1689$)，科學 ($X = .4995$, $SD = .1934$)

* $p < .05$. ** $p < .01$. *** $p < .001$.

2. 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變項

與何瑞珠 (1999) 小學家校合作的研究結果一致，「家中藏書數目」對三種能力的成績都有明顯的正面效應。家中有多少書，反映家庭的文化素養、文化資本。這結果顯示並非富家子弟就一定成績好。一些並非有錢的家庭著重子女的培養，包括提供豐富的文化資本的家居，則其子女的學習表現可以很好。

按道理「家中藏書數目」與家庭的經濟資本有相關（ $r = .321$, $p < .01$ ），因此當此兩變項同時引入方程以預測三種能力的成績，可能因相互影響而會令變異數的消減降低。但若兩變項只取其一，皆發現變異數的消減只有降低而沒有增加。這證明文化資本對學生基礎能力的影響獨立於經濟資本之外。

3. 性別因素變項

性別因素的效應方面，本研究發現女生在科學的表現較男生為差。但若再同時引入各社會資本的變項，則此科學的成績的男女差異並不顯著，但在數學的表現較男生為差。女生在閱讀的表現較男生為佳，就算引入背景因素及各社會資本的變項，女生在閱讀上的成績仍然顯著高於男生。

4. 父母及子女本地出生

「父母本地出生」則與數學能力的成績呈負相關，亦即若父母移民來港，其子女在數學方面成績較佳。然而「學生本地出生」對數學能力、閱讀能力和科學能力的成績都有明顯的正面效應。換句話說，與本地出生的學生比較，國內出生的學生的三種能力較差，可能是缺乏資源、未能適應香港的社會及自信心較低等原因。但真正原因還需詳細的探討才可知道。

社會資本變項

將背景因素變項首先引入迴歸方程中，然後才將三種形式的社會資本作為自變項引入方程中，發現對學生數學能力、閱讀能力和科學能力的成績的差異分別解釋了5.9%、6.8%和5.6%的變異數（見表五模式II）。當引入社會資本各變項，從模式II中所增加變異數的消減顯示，解釋學生學業成效的差異得以改善。雖然解釋力並不高，但肯定社會資本的效應是顯著的。在社會資本各變項中，「家內學習討論」此變項是最具解釋力，它與數學能力和科學能力的成績呈顯著正相關。而「父母教育期望」則與閱讀能力的成績顯著地呈正

相關。此外，「認識同校的家長」此變項與數學能力的成績也呈顯著正相關。

家庭結構變項在一些西方研究（例如：Teachment, Paasch, & Carver, 1996, 1997），對學童的學業成就的預測有幫助。可是本研究「與父母同住」此家庭結構變項，對測試結果的預測沒有幫助。學生生活在一個結構健全的家庭理應有助他們的學習，但在分析中未能確立此論點。因為樣本中大部分學生（88.9%）均與父母同住，所以學業成績與跟父母同住此變項的關連極弱。

Coleman(1990)將母親對子女學業成就的期望作為預測學生輟學的指標，而本研究所採用「父母教育期望」能夠預測學生學業成效，亦屬合理的結果。至於「家內學習討論」對學業成績的影響是較易理解。子女若能得到父母多些溝通，子女在實質上及心理上都會有較多的支持，令他們在學習方面較為積極進取。

本研究發現一些社會資本變項的效應可能是負的。例如「校內參與」和「管治的期望參與」與閱讀能力顯著地呈「負相關」。為何家長「校內參與」越多，則學生閱讀能力越低？這結果的出現，可能因為成績較差的學生家長需尋求家庭以外的協助，例如多些校內參與以了解子女的學習問題。至於「管治的期望參與」的負效應，可能是成績較差的學生家長對學校行政不滿，認為子女成績差與學校的管治、教師的任命有關，因此期望更多參與以影響學校決策。此外，「認識子女要好同學」越多，則學生科學能力越低。這結果的出現及可能的解釋，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結論

根據社群主義的觀點，社會資本的效應應是正面的，但從本研究結果可見，社會資本變項的效應有些是正面的，但亦有些是不相關，甚至是負面的。以這結果而論，可引證Woolcock及Narayan對社群主義觀點的社會資本的批評。但在下此結論時，亦要檢視那些負面效應是否因為在量度社會資本時，在操作定義上出問題所致。

本研究採用Coleman(1990)的理念來量度社會資本，確實有一些限制。Coleman社會資本的理念是基於西方社會的脈絡，本研究則基於東方社會的脈絡。例如「與父母同住」這因素在本研究與學生學業成效無關，以香港為例，單親家庭不足百分之十，這結果明顯因東西方的家庭結構的不同所引致。此外，家長校內參與及管治期望兩種社會資本與學生閱讀能力的成績的負相關，亦可能基於文化的不同而出現。可能是學習問題愈嚴重的學生，其家長才更積極參與及有更高的管治期望。因此，來自西方被視為正面的社會資本，當用於東方社會及家長時，不一定有效。

本文主要研究社會資本與閱讀、數學及科學能力的成績關係。對於每一種能力的成績，社會資本變項的效應都略有不同，從研究結果中發現，大部分社會資本變項與閱讀、數學及科學能力的成績無關。至於有相關的部分，效應有正面亦有負面。因此，社會資本的效應不能一概而論。因此，當應用社會資本時，在不同文化脈絡下，需界定清楚社會資本及其效應應如何理解。未來的研究可嘗試集中剖析社會資本對某一特定能力的效應，或拓展學習成效的範疇，以探索學生的自我觀、興趣及自學能力與社會資本的關係。這些均是有待正式測試數據完成後，宜再作探討的重要課題。

由於本研究是HK-PISA的預試，故取樣方面並非一個完全隨機樣本，且樣本數目並不多。因此，部分結果有待正式測試的數據再次驗證。例如進行分層迴歸分析時，當第二層引入社會資本變項時，樣本的數目會銳減（例如預測數學能力時，樣本的數目會由319減至260），而性別變項由顯著變為不顯著，有可能是學生基礎能力的性別差異，由兩性間的社會資本不同所引致；亦有可能是樣本數目少引致。而正式測試採用一個數目較大的隨機樣本，再進行與本研究相類似的統計分析，則預期所得的結果較確切。

本研究所採用的統計方法主要是一般的迴歸分析及分層的迴歸分析，但一些變項的效應，若以個人為分析單位時，並不顯著。例如一些背景變項，若以學校而非個人為分析單位時，例如學校平均社經地位，則結果可能較顯著。從數據的結構來看，每所學校均有

三十五位學生參與評估，這正是一種兩層架構，正是分析單位的問題，這問題可透過使用HLM(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而得以解決。因此，當正式測試進行後，再進行HLM統計分析，則預期可得到較可靠的分析結果。

雖然本研究只是對香港PISA預試結果的初探，但仍可得出以下一些研究啟示：

在本研究所使用的社會資本變項中，「家內學習討論」此變項與數學能力和科學能力的成績皆呈顯著正相關，且效應最強。這顯示作為家長，若想提升子女的成績，宜特別注意在家中與子女多溝通，包括談論功課、討論時事和一般聊天等。而「校內參與」和「管治的期望參與」這兩個社會資本變項則與閱讀能力的成績顯著地呈負相關。這意味家長的校本參與在中學階段仍然是問題取向的。學生在學業或行為方面出現問題，家長才參與學校，與學校聯繫。這假設仍有待透過質性研究來釐清。

在本研究所使用的背景變項中，家中藏書數目與測試成績呈顯著正相關，且效應最強。這顯示書刊的正面效應不容忽視。家長若想提升子女的成績，可考慮購買多些益智的書籍放在家中，以培養子女閱讀的習慣。至於「學生本地出生」此背景變項，則與測試成績呈顯著正相關。此結果反映國內學生可能缺乏朋輩支援網絡，而他們的父母也同樣缺乏家長的支援網絡。在缺乏資源和支援的情況下，國內生成績較差是可預期的。因此，政府應對這些學生和他們的家庭提供更多合適的支援和協助。

參考文獻

- 何瑞珠(1999)。〈家長參與子女教育：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的闡釋〉。《教育學報》，第26卷第2期，233–261。
- Astone, N. M., & McLanahan, S. S. (1991). Family structure, parental practices and high school comple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309–320.
- Coleman, J.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leman, J. S., & Hoffer, T. (1987). *Public and private high schools: The impact of commun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Etzioni, A. (1993). *The spirit of community: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communitarian agenda*. New York: Touchstone.
- Etzioni, A. (Ed.). (1998). *The essential communitarian reader*.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Ho, S. C. (2000). The nature and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in three educational systems: Singapore, Korea, and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2), 171–189.
- Ho S. C., & Willms, J. D. (1996). The effect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on the achievement of eighth grade student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9(2), 126–141.
- Muller, C. (1993, April). *Parent ties to the school and community and student academic performa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LA.
- OECD (1999) *Measuring student knowledge and skills: A new framework for assessment*.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Tam, H. (1998). *Communitarianism: A new agenda for politics and citizenship*.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Teachman, J. D., Paasch, K., & Carver, K. (1996). Social capital and dropping out of school earl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8, 773–783.
- Teachman, J. D., Paasch, K., & Carver, K. (1997). Social capital and the generation of human capital. *Social Forces*, 75(4), 1343–1359.
- Wall, E., Ferrazzi, G., & Schryer, F. (1998). Getting the goods on social capital. *Rural Sociology*, 63(2), 300–322.
- Woolcock, M., & Narayan, D. (2000). Social capital: Implication for develop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policy.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5(2), 225–249.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arianism and Creating of Social Capital: Analysis of the HK-PISA Trial study

Terence Y. P. Lam and Esther S. C. Ho

Abstract

The discourse of social capital has fueled a growing interest in the field of sociology, economics and education as one of the strategies to solve a number of socioeconomic problems and to enhance children's education. However, it appears that the meaning of "social capital" varies with peopl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meaning and generation of social capital from a communitarians' perspective. Data for this study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trial study of a larger international project called PISA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which was conducted in 2001. A total of 1,067 fifteen-year-old students from 31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completed student assessment in reading,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A total of 1,061 parents also completed parent questionnaires. Factor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are used in this paper. The study identified thre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and different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have different association with student academic achievement; however, the association is not always positive.